

两面之词

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法〕雷吉斯·德布雷 赵汀阳 / 著

张万申 / 译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两面之词

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法〕雷吉斯·德布雷 赵汀阳 / 著

张万申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 赵汀阳, (法) 德布雷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086-4512-4

I. ①两… II. ①赵… ②德… III. ①革命—问题—研究 IV. ①D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59460 号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著 者：赵汀阳 [法] 德布雷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3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512-4 / D · 277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2011年5月在法国南方的太一庄园 (Les Treilles) 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第一轮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会议的第二天就社会的演变方式进行了辩论。这天主持讨论的是年轻时代在南美随切·格瓦拉打过游击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他注意到来自北京的赵汀阳的发言，赵汀阳讲到对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激情理想可能引起的非理性后果的一些疑问。德布雷虽然已离开政治舞台多年转而从事文学和学术，但面对“革命”这个影响了他一生的题材，不可能漠然置之，在多年的反思之后，德布雷有很多话要说。在西方左派学者眼里，中国是一个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当听到来自中国的学者的看法，德布雷深感兴趣。在休会进餐的时

候，德布雷找到赵汀阳，建议用通信对话的方式更深入地继续讨论而形成一本合作著作。

免于喧嚣，远离媒体，让中法知识分子有机会真正地互相了解、真诚对话，这本来就是德布雷的愿望。太一庄园会议原就是德布雷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提出的计划。德布雷在2010年前往上海世博会去参加一场讲座时，在飞机上与我谈起这个设想。三年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三次成功的圆桌会议，两次在法国，一次在中国，参会者们成了朋友，对话经验没有使人失望。赵汀阳和德布雷也继续了他们的书信讨论，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从政治和宗教到历史和哲学等等。两个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家，不去使用学术黑话或专家调门，不去回避敏感的主题，也不躲避在各种简单化的口号后面，是否能够在当今中西方都多有偏见的环境里发言？这正是这个不寻常的书信讨论所面临的挑战。雷吉斯·德布雷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赵汀阳也不是法国问题专家，两人各持的独特风格、立场和观点，都属于少数派，这正使他们的对话更加珍贵而有益。生活的偶然性使我碰巧掌握了中、法两种语言，我很乐意把这

两位朋友的信件忠实地翻译为对方的母语，让双方能够更准确地彼此理解。

尽管赵汀阳对西方古今哲学了如指掌，却仍然自认只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他运用中国古代思想来分析当今世界遇到的问题，引起了德布雷的兴趣。赵汀阳选择“行事”（他翻译为拉丁文 *facio*）作为哲学问题的支撑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Médiologie*），因为媒介学关心的是技术发明对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带来的实际影响。两人的书信交流也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赵汀阳的哲学思路连续而跳跃，从一个问题链接到所有问题，又回到原来的问题；雷吉斯·德布雷文字激扬，辩论风格直截了当，也许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这也增强了这次排除去僵化陈词和顽固成见的对话的价值。汉学家或法国专家不可能垄断两种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探讨性的对话。

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一种明显的道德危机，甚至可称文明危机，同样在东西方导致了不稳定的影响，类似的方向迷失盛行在这里也在那里。从本书的对话可以看到，中法两国相隔虽远，但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

得更相近。赵汀阳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一半现实是西方，中国已经在“内化”西方。的确，中国很认真地把西方当回事，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问题确实变成了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个奇异的历史交叉引起了德布雷幽默的反应：“假如西方的诱惑（*tentation de l'Occident*）在你们那里成功地导致对我们的东方诱惑变得过时和无内容了，那将是够好笑的……”

人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产生误解或者虚假的同意，要把它们完全消除只是一种幻想。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围墙、语言和家谱等等，而充分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空间是必要的，这可不是为了在一起理解当前某个火爆的新闻，而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共同未来。

张万申（Jean-Paul Tchang）

巴黎

序2

2011年5月，在法国南部山区的太一庄园（Les Treilles）里，我参加了法中文化圆桌会议，在那里结识了德布雷先生（Régis Debray）。德布雷早年是著名的革命理论家和亲身实践者，他曾经与格瓦拉在丛林里并肩作战。这种实践经历让他发现了革命许多复杂的内在矛盾。

在Treilles会议上，我们正好讨论到革命的复杂性。Treilles会议采取了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的一种讨论方式，长达一周的慢慢讨论，而不是那种每人15分钟的发言，于是我们有机会就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多说几句，尽管这仍然远远不够。像革命这样的重大问题，也许永远也讨论不够，何况在讨论革命问题时，又涉及到历史、

进步、理性、理想、人性等甚至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都深感需要一种延伸讨论。会议结束那一天，德布雷先生提议：我们不妨一起写本书，把需要说的接着说下去。我们确定了采取通信对话体进行讨论，不仅讨论革命问题——革命问题只是一个引子——也将讨论自然而然涉及到的问题，顺其自然地自由出入并未预先设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并不知道都会讨论到哪些事情。于是，我们让这个会后延伸讨论具有一种实验性和探索性，相互提出质疑，虽然一个研究者自己在理论的棋盘上也会反复设问，但仍然不能代替来自另一个人的质疑，互相质疑使讨论出现了未知的延伸性。事实上，对于一个重要问题，任何讨论都仍然只是多说几句而已，任何重要的问题都比人的头脑复杂得多，人或许够着了问题，但不可能彻底理解问题。我不相信黑格尔式的那种试图把一切尽收囊中的哲学，我宁愿相信“潜无限”而不是“实无限”。

革命是我们这个讨论的人手问题。革命是否是一种足够好的变革方式？众所周知，革命具有翻天覆地立竿见影的魅力，但其良莠不分的破坏力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老问题。我试图论证，把翻天覆地的革命化为步步为

营讨价还价的变革可能不仅稳妥，而且更为深刻。因为激情理想的智慧含量未必能够与千年传统的智慧含量相比，而且，减弱为因势利导、合情合势的逐步细节改革对顽固的现实可能更具以柔克刚的渗透力，能够积小变而成巨变，最终迫使现实就范，由此而形成的革命效果可能更稳固。不过，慢慢的革命看上去就几乎是保守了，德布雷先生似乎对此并不满足，他疑心此种保守态度是一种“英国经验主义的短视”。虽然我对英国经验主义确实怀有同情，但更重要的思想根据其实是老子的流水方法论：顺势渗透是阻力最小化的演变方式。德布雷对激烈的革命尤其是输出革命的做法有着深刻的反思，尽管他已经转变为现实主义者，却仍然对革命的理想性怀有一种已经理性化了的激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对于德布雷，对于欧洲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革命不再是冒失的激烈行动，而变成了一种生活和思想态度，一种看问题的方法论，一种令人羡慕的方法论，在其中实现了永远革命的激情和生存状态。那么，是否有些事情是能够革成命的？是否有些事情是如此顽固而革不成命的？这又需要慢慢考察。

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张万申（Jean-Paul Tchang）对我们的通信帮助最大，他法文和中文皆为母语，由他承担我们之间通信的翻译工作，使我们得以使用各自的母语写作。张万申先生是经济学家，也是法国 1968 年革命的亲历者，他于百忙之中为我们提供了巨大帮助，事实上张万申先生可以说是这个对话的导演，特此致以好朋友的感谢。

同时也感谢法国太一庄园、法国谢阁兰基金会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然还有中信出版社。

赵汀阳

北京

目 录

序1 // IX

序2 // XIII

第一组通信 // 001

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组通信 // 033

赵汀阳：我一直有个困惑：人类追求许多美好概念，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普爱、进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个概念单独来看都是好的，但这很像我听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4个弦乐艺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给他演奏其创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分别演奏得很好，真的，每个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经历一场危机，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一场意义的危机，正如你感觉到的一样。我们这儿任何人可以对一切发表任何意见（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个人自由），但实际上谁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原义）变成了鬼魅，很明显，真正当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监督之外而被决定的，在自我封闭的（国家的、欧盟的、国际的）圈子里决定的。

第三组通信 // 067

赵汀阳：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德布雷：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划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第四组通信 // 099

赵汀阳：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德布雷：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殊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第五组通信 // 137

赵汀阳：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心应手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德布雷：自 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第六组通信 // 177

赵汀阳：“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德布雷：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